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

李 怡 教鹤然 李乐乐 等著



“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GUANGDONG PUBLISHING

丛书总主编

蒋 述 卓

陈 剑 晖

贺 仲 明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GUANGDONG PUBLISHING

本丛书入选：

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7年广东省重点出版物暨“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2018年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项目

丛书总主编

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李怡 教鹤然 李乐乐 等著

『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李怡，教鹤然，李乐乐，等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10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ISBN 978 - 7 - 5361 - 6322 - 5

I. ①文… II. ①李…②教…③李…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127 号

出版人：唐永亮

策划统筹：黄红丽

责任编辑：何栩隽

责任技编：肖宿华

责任校对：陈利群

装帧设计：国 梁

书 名 “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

“WEN” DE CHUANTONG YU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电话：(020) 87554153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陈思和 陈晓明

总主编：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丁晓原 王尧 王兆胜 王春林

叶立文 刘勇 刘艳 刘晓明 李怡

李建军 李春雨 李继凯 李遇春 汪树东

宋剑华 张志忠 张清华 陈国恩 陈思和

陈剑晖 陈晓明 周群 於可训 咸立强

贺仲明 郭小东 郭冰茹 唐永亮 黄红丽

蒋述卓 雷实 管宁 谭桂林

总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在这几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厚重和更持久的力量，因它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那么，当前应如何传承传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正是立足于这一历史和现实语境，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发现，将其有价值和有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资源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此推进“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梦提供有益有效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

本丛书不是面面俱到地阐释传统文化，而是以专题为统领，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存在的弊端，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其对接并灌注其中，从而催生出一种符合新时代的新文学。比如，丛书的第一本《“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技巧越来越高，艺术形式越来越精致，但文学的路子却越走越窄，文学精神越来越稀缺的事实，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必要到传统的源头去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强大自身。所谓“传统的源头”，就是“文”的传统或“杂文学”的传统。在“文”的传统中，文体既是体也是用，既是道也是器，文体的变革

也是文学的变革。本书还从文章的体制、风格、文气以及叙事传统等方面，论述现当代文学应如何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不应矮化自己，“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

从文学所体现的实用价值和政治功能方面的内涵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文学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它主要从“入世”“有用”的精神维度，确立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中国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的欲望的膨胀，人文理想的失落，多元价值观的出现，作家的写作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叙事”变为个人的“小叙事”，从过去高扬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转变为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不少作家失去了介入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激情和勇气，而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与他们也就渐行渐远。因此，要振兴当代文学，就必须要求作家“文以载道”，追求文学的“有用”功能，要求作家创作要有“家国情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小家”和国家民族的“大家”统一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当下的优秀作品。丛书的第二本《载道传统与文学的使命意识》通过对“文以载道”概念的梳理阐释，重申文学的伦理道德与使命意识。

我国的另一个优秀文化传统，就是“道法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都是强调人与物即自然的融合和转化。在“万物将自化”的理念中，物化既包含人的变化，也包含物的变化，同时也是物与人的互化。在中国的传统散文中，如《世说新语》《秋声赋》等，都达到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学这一优良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夸大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对天地自然的忽略乃至无知，也导致了社会和谐的失衡。所以，在倡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当下，当代作家要向古典文学学习遵循天地自然的法

则，克服人类至上的立场，将人与自然同一化，从而将自己及其作品培育得臻于完美。丛书第三本《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对此做出了回应。

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浪漫翱翔、瑰意琦行的传统，从庄子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屈原的《离骚》，到李白的诗歌、陶渊明的“桃花源”，这一浪漫传统的归潜与飞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浪漫主义的传统几近绝迹。尽管有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倡导，但那不过是一个口号，并没有真正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因此，中国当代文学要从重物质、轻精神，重欲望、轻理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就必须继承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为文学注进生命激情和梦想。唯其如此，理想的文学才有可能出现。丛书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浪漫与理想》既重拾这一文学传统，又恢复了中国文学应有的文化自信。

总体来说，丛书确立了三个维度：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维度；三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维度。通过对三个维度的融会贯通，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此，丛书共收录 13 本著作，有些侧重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方面挖掘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有些侧重从艺术方面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丛书虽属主题性出版，但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原创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建设性和前瞻性。中国现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一是写作技巧越来越高，越来越精致化，但同时却是越来越小气和匠气，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二是许多作家缺乏社会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三是缺乏理想的文化生命人格塑造，也缺乏诗性精神和浪漫情怀。四是审美缺失，文风粗鄙。五是当代作家大多言必称西方，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丛书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来设计主题，这样便既有现实针对性，

也不会重复别人。与此同时，丛书又注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传承对接，尽量从现当代文学中挖掘“文化自信”的因素，并强调在“解构”中“建构”，力图使丛书既有建设性又有前瞻性。

第二，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也存在着不少糟粕，因此要立足于现实，用时代精神去凝练、去整合传统文化，并善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丛书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文的传统”“文以载道与家国情怀”“道法自然与天地并作”“超然浪漫与文学理想”“诗性飞翔与审美之维”“理想文化生命人格的重塑”等主题，正是在创造创新中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三，宏观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丛书虽有较宏大的构想和命题，但绝不同于那种假、大、空的理论。因为丛书要求每位分册作者，一定要把“文化自信”的理念落实到某个层面、某一个点，要有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总之，命题要宏大，观点要创新，方法要实证，细节要丰满。

第四，强调学理性，又兼顾可读性。丛书作者均为国内知名，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且有较好的古代文学素养的学者，这为将丛书打造成学术精品这一总体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提高他们阅读的兴趣，丛书兼顾了学理性和可读性两方面，尽量回避过于“学院化”的表述，用鲜活优美、灵动诗性的文字来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构建“中国学派”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但是，过去中国的思想理论贡献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极不相称，这其中有着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更主要的在于我们热衷于向“西天取经”，在为西方思想提供

注脚方面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而忽略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这样自然便不够自信，便妄自菲薄，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无法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希望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价值再发现，在构建“学术中的中国”方面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是的，在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历史中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它将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和自觉的文化担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未来，用时代精神去凝练、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文学来阐述“文化自信”，以此推进“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丛书获得了评审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先后获得“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立项”“2017 年广东重点出版物暨‘百部好书’资助”和“传承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和原创精品立项”。相信随着丛书的出版，“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命题，会越来越广泛地引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2018年9月4日

CONTENTS

目录

| | |
|-----------------------|------|
| 绪论 重述我们的“文学”传统 | /1 |
| 一、历史转折与“文学”地位的升降 | /2 |
| 二、“文学”研究：从大梦想回到小细节 | /7 |
| 三、“文学”研究：从“小纯粹”到“大历史” | /11 |
| 第一章 “文”与“文学” | /17 |
| 一、“文”之概念的由来与演变 | /19 |
| 二、何为“文学” | /36 |
| 三、“文章”寻踪 | /47 |
| 第二章 传统中国驳杂的“文学”追求 | /61 |
| 一、中国古代驳杂繁复的文学形态 | /62 |
| 二、中国古代庞杂的文学体类 | /71 |
| 三、中国古代诗史结合的文学情怀 | /77 |
| 第三章 近代文体嬗变中的“文”与“文学” | /93 |
| 一、近现代中国的文学危机与转机 | /94 |
| 二、西方文学史上的“纯文学”追求 | /106 |
| 三、五四新文学的“纯”与“不纯” | /117 |

| | |
|-----------------------|------|
| 第四章 时代语境下的“大文学”氛围 | /127 |
| 一、现代中国的“非文学”氛围 | /128 |
| 二、是“非文学”还是“大文学” | /160 |
| 三、“大文学”观的“大”格局 | /178 |
| 第五章 从乱世民国到战争民国：现代中国文学 | |
| 在“大文学”格局中持续发展 | /189 |
| 一、乱世民国的“文学”基因 | /190 |
| 二、民族战争与“文学为了人生” | /211 |
| 三、政治主导下的文学挣扎方式 | /228 |
|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大文学”指向 | /249 |
| 一、鲁迅：杂文之争背后的意味 | /251 |
| 二、巴金：“真”与“无技巧”的意蕴 | /264 |
| 三、“大文学”视野下的《吴宓日记》 | /279 |
| 结语 “大文学”需要“大史料” | /305 |
| 参考文献 | /312 |
| 后记 | /316 |

绪 论

重述我们的“文学”传统

本书试图重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提出反思和清理，其目的是为了重述长期为我们忽略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结构。

重述并不是为了“颠覆”历史的表述，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洞察历史的细节，特别是解释那些历史表述中模糊、含混的部分。我们相信，只有在关于“文学”观念的细致的梳理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和内在机理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而它的价值也才能够进一步确立。

这样的清理将形成与目前研究态势的直接对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方式将被重新审视和观察，虽然审视和观察并不是为了否定那个时代最宝贵进取精神。

一、历史转折与“文学”地位的升降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中外多种文化的滋养中发展壮大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是好几代中国作家刻意突破传统写作方式重围，勉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重大收获，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否承认外来文化以及外来文学之于中国现代诞生的特殊作用，几乎就是我们能否把握这一文学基本特质的最重要的立场。承认了这一事实，我们才有效地打开了进入现代文学的窗口，把握了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方向，拒绝这一事实，或者是以暧昧的态度讲述这一历史都可能造成我们视线的模糊，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确立“现代的”“世界性”的目标的特殊意义。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在情感的层面上体谅和认同这些新文学创立者因为引入外来文化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付出的种种艰辛，我们简直也无法深入到现代文学的精神内部，去把握和揣摩其微妙的心灵的起伏、灵魂的温度。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情

结”，一切“回到现代文学本身”的热切的情怀，都只有在这种从理性到感性甚至本能情绪的执着“认同”的层面上获得解释。在已经过去、迄今依然令人回味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曾经以“回到五四”来想象这个年代的历史使命——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与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紧密相连。在那时，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吸纳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挖掘，现代的文学确立起了前所未有的荣光，“走向世界”的声音既来自国家政治，也理直气壮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阐述当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①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已经接近尾声，也没有理由将这一曾经的主流性理论当作永恒不变的前提，因为，就如同近代作家通过举起“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来突破传统、确立自我一样，今天的学人也有必要通过提炼、发现自己的“问题”来揭示文学发展更内在的结构和机理。

这并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需要通过否定五四、质疑甚至颠倒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来彰显自己。中国学术早就应该真正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了，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指谪五四和80年代的进化论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其实自己却常常陷入这样的思维而不能自拔。如果五四的确通过大规模引入外国文学与西方文化完成了对传统束缚的解脱，如果80年代是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鼓舞”下拨乱反正，部分建立了学术

^① 这是最形象地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精神的著作，不仅著作的正副标题都清晰地标注出了时代的主旨，著作的绪论全面地阐述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宏大图景，各选文的作者都紧紧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启示中茁壮成长加以论述，这些论述都代表了当时学界最活跃、最有实力的成果，可谓80年代学术之盛景。参见：曾小逸.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的自主性，那么这种种呼唤创造的企图和方向不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吗？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否定五四的“西化”态度、诋毁 80 年代“走向世界”的赤诚来完成新的学术表述呢？

事实上，学术的质疑归根到底还是对前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的发掘，而不是对前代学术的彻底清算；学术的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最终推进了我们的认识而不是证明新一代的高明或思想的“优越”。何况，在所有这些“问题”的不同阐述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各自学术的根本意义的差异问题。严格说来，学术的意义只能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丈量和衡定，也就是说，是不同时代各自所面对的历史状况和问题的针对性决定了学术的真正价值，离开了这个历史语境，并不一定存在一个跨越时空的“绝对的正误”标准。不同时代，我们对问题的不同认知和解答乃是基于各自需要解决的命题，其差异几乎就是必然的。

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展开 20 世纪 80 年代对文学史的结论，重新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是为了颠覆 80 年代的“思想启蒙”和学术立场，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学术的深化。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对于“文学”的认知其实已经与 20 世纪 80 年代大有不同了。这不是因为我比 80 年代的人们更高明、更深刻，而是今天的我们身处与 80 年代十分不同的环境。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几乎就是全社会精神文化的中心，甚至国家政治、伦理、法制、教育的巨大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归结到“文学”的领域来加以确定和关注。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改革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就是在对新文化传统的想象当中展开的，是在对五四传统的呼唤中开始的。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很多人，言必称五四，言必称鲁迅。以我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例，基本上无论是搞外国

文学也好，搞比较文学也好，搞现当代文学也好，搞美学也好，搞文艺理论也好，他们学术兴趣的起点几乎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从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开始的。甚至普通的中国人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新华书店隔一段时间“开放”一本书，隔一段时间“开放”一个作家，老百姓排着队在新华书店的门外买书，其中很多是新文学的作品。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探索、一些思考、一些问题，直接成为我们思考、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包括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重要根据。那个时候讲教育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班主任》的意义不是一本小说的意义，而是带来改革整个教育体系的启迪。到后来，工厂搞改革，全国人民都知道一本《乔厂长上任记》，大家通过阅读这本小说来研究中国怎么搞改革。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的人家》，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野山》。电影上演后，引发了全社会对改革时期家庭伦理问题的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题目直接就是《改革，就必须换老婆吗?》。因为贾平凹在小说里讲述了农村改革时期两个家庭的重新组合问题，大家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的示范，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处理问题直接可以从小说中得到答案。中国人生活中的很多困惑都会通过80年代那些著名的小说来回答，包括那个时候城乡流动，很多农村的人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想到城里边来，改变“二等公民”的地位……那时候有一部小说特别打动人，那就是路遥的《人生》。在《人生》开篇的地方，路遥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样的文学表述一下子就被当作“人生金句”，成了中国人抄录在笔记本上的格言，到处流传。我们的文学就是如此深入地介入了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几乎一切的领域，直接成为人生的指南！

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的经济方式继续在中国渗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有了新的娱乐方式，“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而且文学也不再探讨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再

执着于现代的启蒙、反思和改造国民性之类的沉重话题，或者这些话题也巧妙地隐藏在各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中。“大众娱乐”的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认可，一些重要的通俗文学地位上升，例如金庸武侠小说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进入了“文学史”。

最近一些年，人们开始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重新思考五四，质疑五四。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过分相信西方，五四虽然有好处，但是五四也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割裂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五四的最大问题是偏激的激进主义观点，割裂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很多优秀传统。所以说，五四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成了今天重新被人质疑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打倒孔家店”。有人说今天我们怎么能“打倒孔家店”呢？你看看今天人人都要重新谈孔子了，重新谈国学了，国学都要复兴了，那五四不是有问题吗？五四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偏激，他们偏激地引进西方文化，而又如此偏激地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今天，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就是以对五四的继承开始的，但又是以对五四的质疑告终的。

在这里，我们暂时不对形成这些历史转变的复杂原因做出分析挖掘，而只是借此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无论我们的情感态度如何，我们需要研读的“文学”都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我们对这样的变化持怎样的遗憾或者批评，都不能不看到它本身绝非荒诞不经的，也深刻地体现了某种思想文化逻辑的真实面相；在今天，我们只能将“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表现与曾经如此富有轰动效应的文学梦想一并思考，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从而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的命运重新做出解释。